

公祭毋忘翦淞阁

□ 梁鼎成 胡晓林

清康熙年间,为保淮扬百姓免遭水患,翰林院侍读乔莱上疏《束水注海四不可议》,得罪中枢权贵,不久便受谗毁,罢官归里。他在宝应县城东北隅购得一方隙地,因势赋形,构建纵棹园。品茗寄兴,诗酒自娱,编剧度曲,读《易》其中。在园的西北角叠土为山,覆亭其上,名曰:翦淞阁。该阁坡临水面,溪流环绕,四周花木葱茏,上下五彩相映,春来翠竹生笋,秋至枣树垂金。登高远眺,清风拂面,真乃优雅之极。清嘉庆元年,为教育计,侍读裔孙捐送园基,献出园的北边一半,创办画川书院,翦淞阁亦随之从纵棹园中划出。

20世纪40年代末,日寇侵占宝应,画川书院被日军侵略军强占,侍读公的一脉香烟后代乔熹亭及其子乔厚之,被日寇无辜残杀于翦淞阁下。那如诗如画的翦淞阁,却成了乔家的痛心地。

《宝应县军事志》载,民国28年(1939)深秋,驻望直港的国民党第89军第117师第702团,抽调100多名爱国官兵,组成“奋勇队”,于11月19日,夜袭俗称“鬼子窝”的日军驻地画川书院(后来的宝应中学旧址,今实验初中)。在干掉两个哨兵,迅速拆除“拒马桩”后,摸入敌营房,砍杀鬼子多人。混战中,国军班长宁克功在救出身负重伤的队长后陷入重围。他毅然拉响缚在腰间的手榴弹,与敌同归于尽。此战歼灭日军30余名。

8天后的11月27日零时,围攻宝应城的战斗又打响了。该部的349旅697团和698团共500余人,分兵三路,同时向驻扎在画川书院、曹家花园(痘神庙街北首)和

小南门交通旅社的日军发起攻击。但因日军工事坚固,防守森严,加之拥有轻、重机枪、迫击炮、火炮、坦克等重武器,还有停泊在运河码头和宝应湖中的汽艇与小型军舰的接应,战斗十分激烈,双方相持不下。国军因缺乏攻坚武器,打得非常艰难。至上午10时,各部交替掩护,退出宝应县城。此战虽未挫败日军,但也取得击毙50多名鬼子、摧毁坦克一辆的佳绩。

受到两次沉重打击的日军,苦苦寻思应对之策。他们无法报复国军,便迁怒于手无寸铁的宝应百姓。日寇认为,国军之所以得手,县城内必定有人与之里应外合。12月上旬一天的下午,天色阴沉,寒风呼啸,由汉奸引路,日军队长高桥带领数名鬼子兵,直奔朱家巷北首的乔宅搜查。主人乔熹亭及其子乔厚之适巧回家取物,未及出走躲避,被堵在屋内。日军到处乱翻,发现一根赭色皮带子,认定是国军佩用的,视为乔家充作内应的证据。其实此物街上即有销售,出于好奇,买回来不过是把玩而已。乔氏父子百般解释均属枉然,硬是被强行押至日军营房。当即严刑拷打,逼他俩招供。乔氏父子知道,被带进鬼子窝里的中国人,是不可能活着出去的。他俩秉承祖训,父子相约,咬紧牙关,宁死不招。尽管酷刑难熬,几番死去活来,都没有攀扯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,为的是不让其他无辜再遭祸殃。日寇见无法得到所需的口供,夜晚,便将二人打入结着薄冰的水牢。

次日拂晓,呼啸一夜的北风骤停,地面上凝结了一层厚厚的银霜。乔氏父子都被剥光衣裳,分别绑在翦淞阁东坡的两根木

桩上。先用黑布蒙住乔熹亭的双眼,再用棉花团塞进他的嘴里。接着上来一个手持利刃的鬼子兵,还牵来一条伸着长舌的大狼狗。那鬼子兵是来对乔熹亭施凌迟之刑,而狼狗是等着吃人肉的。

凌迟是一种极其残忍的酷刑,俗称“活剐”。即零刀碎剐,使人犯受尽痛苦而死。沈家本《刑律分考》卷二,引王明德《读律佩觿》云:“其法乃寸而磔之,必至体无完膚,然后为其割其势,女则幽其闭,出其脏腑,以毕其命,支分节解,殖其骨而后已。”残暴的日寇,竟然用这种古老的酷刑来对待无辜的百姓,乔熹亭不幸成了这班强盗们手下的牺牲品。乔熹亭身上的肉被一刀刀割下,又被一块块扔去喂狗。直到肉尽血干,刽子手才剖开他的胸膛,活生生地从里面摘出一颗还在跳动着的心脏。乔熹亭惨死后,日本兵排列成行,依次出列,端着刺刀刺向年轻的乔厚之。被刺人被绑在木桩上,无法躲闪避让,刀刀刺中要害,乔厚之很快丧命。“熹亭”那原本富有诗意美的名字,谁料竟一语成谶。熹微日出之前,高阁小亭之下,上演了惨绝人寰的一幕。风景秀丽的翦淞阁,竟成了日寇屠杀中国人的刑场。在日寇占领宝应期间,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被残酷戕杀于翦淞阁下。

冬去春回,岁月如流,但带不走刻骨铭心的记忆。翦淞阁下年年鲜花怒放,红艳欲滴,让人联想起当年在此被日寇惨杀的乔熹亭、乔厚之和其他许多不知姓名的中国人,不禁悲愤填膺,阵阵仇恨的烈火在心中燃起。

“陈大胆”夜闯虎穴

□ 梁永良

陈立,西安丰镇集丰村人,1943年参加革命工作,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任区联防队小队长。

1948年春天,国民党还乡团还乡时,将安丰镇上的革命干部家属及亲友共60多人全部抓进了安丰国民党的“感化院”。区联防队得知这一情况后,当即写信给安丰国民党还乡团匪镇长梁庆来,要他立即放人。开始他们并不买账,仍然对革命干部家属和亲友进行残酷地迫害。陈立一想到革命干部家属和亲友残遭迫害,就越想越恼火。于是,他单枪匹马,身后插一支盒子枪和一把匕首,带一只葡萄弹,摸进还乡团匪镇长梁庆来的房

间。一看,梁庆来正和小老婆寻欢作乐呢。陈立一进房门,把盒支枪一伸,不许动!然后左手一伸,将梁庆来右腹部的右枪拔下朝口袋里一放,左手朝梁庆来的右肩膀上一搭,吓得梁庆来直哆嗦,结结巴巴地说:“有……有话……有话好说、有……有话好说。”陈立压低声音,义正词严地说:“我今天来不准备要你的命,也不想和你多说多少,只讲两句话:一,感化院的60多个人你无条件放回!如果少一个,我陈立还要来,到时杀得你全家鸡犬不留;二,你要为安丰人民做好事,不要做坏事。”这时,梁庆来跪在地上像小鸡啄碎米似的直磕头。说完,陈立准备动身,梁庆来借

口要送陈立出安丰镇。陈立是经党多年培养具有高度警惕性的人,说了声:“我既进得来,就可以出得去,不用你送。”随即,陈立出了梁庆来家的大门,将其大门搭子插好,门上事先准备的铁钉子,以防万一。

事后,陈立又带着区联防小队从荡里摸到镇上来,抓了不少还乡团的家属并递话过去:“你放我放,你杀我杀。”这一着很灵,敌人畏惧区联防队的陈立等人,乖乖地把抓进安丰“感化院”的干部家属和亲友陆续地放了出来。从此“陈大胆”的浑名就传开了。

呼唤真诚

□ 陈志群

学的脑白金的广告语:“今年过节不收礼,收礼还收脑白金”。现在大家都来效尤。

难道现在做人就要这样吗?我困惑。

“像你们过去那样说一不二,心口如一,现在不时髦了。”我想起了女儿曾对我这样说过的话。

我们现在不合时宜了?言行一致,心口如一的作法也过时了,也该摒弃了。我越加困惑。

吃过酒,老伴的侄女请我们到她家看新房。房子是刚装修过的,新房也布置得很漂亮。侄女和侄女婿没有向新郎新娘介绍一句,就让我们站着或坐着,新郎新娘对我们也没有任何一声表示,对我们视若无睹。

等一对新人走后,侄女指着新房对我和老伴说:他们只住几天,就到婆家去了,以后你们到高邮来,就住这房间,这房子是特意留给你们住的。

好一个“特意”!我差一点在笑出声来,莫非你们在装潢新房的时候,就考虑到将来这新房给我们到高邮来住的?这话谁相信呢?

我又想起我教高三时,一个学生

的家长在中秋节前送我一盒月饼,并对我说:“这盒月饼是我专程到苏州去买回来,专门送给你语文老师的。”

我表示感谢。第二天,我拆开来一看,月饼已发霉了。

我发现在现在的生活中,与人际交往中,一些煽情的,夸张的,言不由衷的语言很多。诸如“我是专程来看望你的”“我是特意为你留的”“我特别想念的”等,其实都只是“顺便”“稍带”“碰巧”“不经意”。过去在民风淳朴,人心善良的时代,人们在交往中并不常听到“特意”“专门”的词语,有的只是平淡,平常的语言,让人感到温馨,如沐春风。我又想,一些人为什么喜欢说些想让人“感动”的话呢?也许他们认为,请客送礼,再加上“热情”的话语,会把事情办得更完美,可结果是弄巧成拙,败人兴致。大体说来,为大家做事或为别人服务时,自制佳话而为人添兴致,让人感动,不如虽无兴致也能泰然处之,虽有瑕疵但很真诚。再说请客一事,找好机会,张罗周到固然不错,但是随便择个时日淡淡地表示一下更好。又如送东西,也只要淡然地说“这个送你”,显出真诚之意。这个时候如找个理由,或面露显摆或惋惜之色,都是极其让人厌恶的。我想起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,每月月底他都要亲自登门向几位年龄稍长的学者“请安”,实际上是奉上酬薪。到了教授家,躬身

作揖,雅叙片刻,便起身离开。薪水,已由助手悄悄交给教授的家人,蔡校长口中绝不提及。真诚让人深感尊重,有时是不需要过多或过分的言语和动作的。比如路遇朋友或同事,也只需握一下手,寒暄一两句就行了,可我一个同事,曾是领导,和你路遇,他老远就高高竖出手臂,到了你面前,抓住你的手,放在他掌心里,来回摩擦,或者把他的手在你的后臂不停地抚摸,那真的叫你不舒服。其实这人当权时对人是相当刻薄的。有些人办事时,看似和气周道,实则是精明世故,说话办事都很圆满的实则是滴水不漏的圆滑。

现在的通讯和交通远比过去发达,但现在的人们感情却越来越淡薄,人们的交往却越来越做作,夸张的表情,夸张的语言,令人作呕。当然,我明白这种“特意”很多时候不过是一种客套,是要表达格外的尊重或亲近。但是,用语言的帽子扣在并不相符的行动上,这种“特意”便成了一种感情高压,甚至近乎诈欺。

七十年前,鲁迅先生就说过:别人答应的话,千万不要当真。现在想来,真是至理名言。人无信而不立,国无信而不兴。我要鼓与呼:长铗归来兮,人无诚。长铗归来兮,人无信。

责任编辑 周荣顺

插队的日子

□ 孙茂秀

虽然离开下舍已四十多年了,我还常常想起下乡插队的日子。

1969年9月20日,我和同伴们背着行囊,走进了真正的水乡——下舍公社大兴大队葛庄生产队,一千就是十年。在这里,开启了我走向社会的人生历程。

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头年下乡的第一个早晨烧早饭。我们班组三个人进行了分工,王宜平卷草疙瘩,我把草疙瘩塞进锅堂内,王荣华看锅。草疙瘩塞进锅堂内,锅堂内火灭了,冒着浓烟就是不起火,我就用嘴吹气把火星点燃,一股火苗冲出锅堂,差点烧了头发和眉毛。王宜平嬉笑说:孙茂秀你要是把头发烧了岂不成了尼姑。三人捧腹大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学会了用稻草烧锅做饭。

早春三月,乍暖还寒。早晨不到五点钟,天还灰蒙蒙的,一层薄薄的霜覆盖在万物上,让人觉得冷飕飕的。“咣,咣,咣”,生产队长敲响村前大榆树上的铁犁铧,并用铁皮土喇叭高声地喊着:“今早去东三十亩挑河泥。”从河边挑河泥到东三十亩麦垄,得走一二百米。一担河泥也有百十斤,我们刚开始挑,不觉怎么,每当走上河坡时,腿就有些哆嗦了,等挑到地里,腿吃不住劲了,再往返几次后,腿和腰都伸不直了。几趟下来,身子就像棉花似的软了,肩膀被扁担压得火辣辣的,像是磨去了一层皮。想不到种地是这样的艰辛。曾记得我们学踩车,乍一看蛮有意思的,两手扶在横杆上,两脚踩在车拐上,上下使劲,随着网齿滚动一股白花花的水流川流不息地注进农田,可是实践起来难度挺大,稍不留神不是脚被拐打,就是滑下车来。

有一件“遭罪”的事,始终不能忘却。那次公社召开知青代表会议,会议结束天色已晚,而且天空阴沉,看这样子就要下雨,我没顾上吃晚饭就往生产队跑。从公社到大兴大队有十多里路,刚跑出去二里地,夜幕降临了,弯弯的月牙从天边露了出来。这时却狂风大作,雷声隆隆,不大一会儿,下起了大雨。雨水顺着鼻梁流了下来,抹一把脸上雨水往前走一步,路在视线中模糊了,那些坑坑洼洼的土道,被雨浇得滑溜溜的。我摔了几跤差点爬不起来,浑身上下像个泥人,虽然看不清自己啥模样,但能猜到一定是十分狼狈。

更难以忘却的是,当时的农村文化生活贫乏,农民过着“早上赶日头,白天扛锄头,晚上带月头,回家抱枕头”的枯燥无味生活。大队组织文艺宣传队,原来在学校里搞过文艺宣传的我,派上了用场,既当演员又当导演,排练节目,到各生产队巡回演出。尽管当时的演出水平不高,还是给农民带来了欢乐。搞文艺宣传没有活动经费,我们宣传队员就身背竹篓,到处采榆树树回来育树苗卖,编织草帘,割柴草、养蚕挣钱。养蚕因桑叶缺乏,我们就做起“小偷”,夜里外出偷采桑叶。一次夜里外出偷采桑叶,被逮了个现行,人和桑叶被扣,我们好说歹说才予放行。每想起这些,就像一次洗礼,也像一种砥砺。

前几年,我们几个老知青一同来到当年插队的老地方看一看。不料这里已经面目全非,极目远望,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新农村画卷。看着美丽的第二故乡,我们引以自豪和骄傲,因为我们也曾在这里洒下辛勤的汗水,奉献过青春年华。

到朋友大林家聊天,我带去一盒茶叶送给他,淡淡地说,这茶叫“猴头”,还可以,给你尝尝。

大林也几乎同时从书房里拿出一盒茶叶,说:你也尝尝我这茶叶。

大林端起茶杯喝茶,我的面前却空的。我说“你给我泡茶啊。”

大林连忙站起来:“啊呀,是忘了泡茶了。”

大林边沏茶边说:“你刚才那句话,真叫人受用。”

我说:我是向你耍茶喝,你还受用?

大林很感慨,说起一件事:

一次,他到一个朋友家,朋友为他沏茶。

朋友说:这是我特意为你留的普洱,五千块钱一斤呢。

“哦”,大林很纳闷,“只有我来你才喝吗?你平常舍不得喝吗?我一年才来几次,这茶叶不怕放坏吗?”

那人显得尴尬,嗫嚅。

我说,你说话也太不留情面了。

大林讲,我是个爽直的人,我最讨厌虚伪。像你刚才说的话,就很直爽,朋友之间就应该这样。

我点点头,现在的人情真的成分越来越少,而假的越来越多了。

我说起了最近到高邮吃喜酒的事情。

上个月,老伴的侄女从高邮打来电话,说她的女儿出嫁,邀请我和老伴